

圣诞节狂欢、感恩节购物、情人节约会……洋节越过越热闹，而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除了放假还剩下什么？

中国年为何越过越没味——

别热了洋节 冷了春节



文/丛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认同心理让很多年轻人热衷洋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习惯把过春节叫做“过年”。过去,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人们平时生活节俭,可是过年却绝不含糊,会把一年的积蓄拿出来,购年货,做新衣,走亲戚……其实,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对于如何过年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进了腊月门,人们开始忙年,比如:扫尘、贴春联、除夕守岁、放爆竹、初一拜年、十五吃元宵闹花灯等等。总之,我国春节民俗蕴含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

可是渐渐地,年轻朋友们对这些民俗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不愿意去了解和继承那些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节日除了聚餐和走亲访友外,他们觉得春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有年味了”,连带着春节晚会就变成了大家发泄的焦点,吐槽春晚则愈加不亦乐乎。与之相反,许多洋节却越来越被青睐,情人节的玫瑰、感恩节的购物、圣诞节的平安夜等,人们过得有声有色。

其实,对于洋节日,开始也就是部分人觉得新鲜,无非借个由头休闲、热闹一下而已,但现在已经发展到许多年轻人对这些节日的起源和过节的习俗都了如指掌,模仿承袭。比如,我们国家的习惯中,新年、春节都是与家人一起团聚,而西方许多国家会有群众等待新年钟声敲响的仪式,于是,引发了2014年12月31日晚上上海外滩踩踏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故。当然,笔者的意思并非反对过洋节日,或者过洋节日就是崇洋媚外,而是说,过度地热衷于过别人的节日而忽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究其原因,是一种认同心理在作祟。

心理学认为,“认同”意指个体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消除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因无法获得成功或满足时,而产生的挫折所带来的焦虑。比如,一个小孩发现自己因为自己很多方面都不如别人,怕大家都不愿意跟自己玩,于是,他告诉大家“我舅舅是警察”,接下来,其他小朋友纷纷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在发展心理学讨论中,“认同”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发展的主要发展任

务,也是协助人格发展的重要方法,比如先是认同成人的好的做法,如负责任、任劳任怨等,而后内化成自己的重要品质,这是对成长有益的。但如使用不当,也可能成为一种防卫反应。例如: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因为他十分仰慕一位著名教授的渊博学识,而该教授的家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很多的书,于是,此人以在自己家里买了一大书架的书的方式向教授认同。另有那些“狐假虎威”“东施效颦”等都是认同的例子。电视剧《双城生活》中郝京妮的婆婆杨曼莉,认为自己保持喝英式“清咖”、吃英式点心,就是自己高雅的体现,是将认同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一个典型人物,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认同有时也可能是认同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些习惯,当然也包括了热衷于过洋人的节日。说白了,这就像是青少年追星一样,就是个人认同他人的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

对本民族文化没自信不认同可导致盲目认同

过分认同过洋节日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对认同对象的信仰极端。对这一心理作如下解析:

心理学家普遍将青少年期称为“心理断乳期”,在这一时期他们逐渐发现,自己以往崇拜的父母并不是什么都对或无所不能的,于是,他们在急于摆脱父母的影响时,便去寻求自我认同。自我认同与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密切相关,也就是我要找到那种让我自豪和有尊严的存在方式。这种表现很像某一年春晚吕丽萍和冯巩演的小品,其中的一段表演是:哪里的人洋气、有钱,人们就纷纷学哪里的口音说话,大陆的人纷纷学港台人说话,因为他们洋气。

如果青少年在认同时能够全面、理性,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由于他们处在成长和发展阶段,价值观并不成熟,所以就会出现认同的片面性,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认同。拿圣诞节来说,西方的圣诞节(Christmas)本身是一个宗教节日,每年12月25日用来庆祝耶稣的诞辰,是西方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和平安夜是很庄重的,圣诞节前夜人们都会去教堂祷告;而我国年轻人大都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接受他们的宗教,只取他们对我们有用的部分,就好比新娘结婚的白色婚纱,在西方是在教堂举行婚礼时穿的,象征着圣洁;而我国的婚礼习惯是色彩艳丽、喜庆,因此红色当是首选。我们的传统服装也多种多样,比如旗袍。可是我们的年轻人认为我们的服装土气,西方的婚纱洋气,所以尽管我们

不进教堂,但白色婚纱我们也要拿来穿在身上。

另外,在这个信息繁杂的现代社会,由于青年人生活范围和个人经历有限,各类媒体对青少年了解外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加之商家出于经济效益而促销的需求,借助对各个洋节的宣传、强化,使诸多年轻人逐渐由认同到认同,再到喜欢、偏爱,直至痴迷。

传统节日只有在合理认同中才会发扬光大

青少年认同他国文化以及节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理性认同,比如在“追韩剧”时能够认同韩国的礼仪及长幼尊卑的规矩;追西方文化时能够认同西方青年人的独立及自我奋斗等,对我国青年人绝对是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所以,加强对青少年认同的引导,社会各阶层责无旁贷。

第一,对青年人个体而言,要通过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多了解我国历史,通过了解加深喜爱。比如,春节写春联就有很多讲究,上下联要字数相同、句型相同,相应部位的字要词性相同、词义相反或相关;在作对联时要讲究声律,一联之内平仄要交替,上下联平仄要相对。再如,我国春节的来历、二十四节气的精准程度等等,越了解越觉得祖国文化的神奇和博大,了解得越透彻就会越喜欢并为之自豪。自豪感增加,自我认同则随之产生。

第二,就家庭与学校而言,父母与教育者应在与青少年的交流中探索和指导对于他国文化的认知,引导青少年从不同层面去认同。对比不同民族文化,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和哲学观点各有千秋,比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英语句子的“线型”结构,蕴含着直意表达,直来直去,句子中每个单词缺一不可,缺了,意思就不对了;而中文语言则委婉曲折,表达意思为主,不纠结在某一字或词上。类似这样有趣的对比,引导青少年将注意力放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深入了解上。只有了解透彻,才有兴趣和喜爱。

第三,就社会与大众媒体而言,应该承担起主流价值引领的角色,让青少年了解到,全世界有很多人正在以会说汉语、了解中国为自豪,树立本土文化中有利于青少年认同发展的榜样;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社会责任。以我们的春节文化为契机,深入地了解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大家齐心协力,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

碎碎念

七个十年,七点感悟

□智效民

按照传统观念,一过春节我就进入古稀之年了。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不让,他们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我把电影票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天,平均每天看一场。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内地影片,还有香港地区影片和译制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兴趣。初二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作文还说得过去。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渡过难关。

后来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便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但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也不是一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坚持读书,等待机会。苦熬七八年以后,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当时父亲问我:“你不是不想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

话虽狂妄,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学一直停办,所以“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蔓延到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放弃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

“文革”结束以后,我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研究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科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腐败。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三不主义”。这样一来,我虽然在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上受到很大影响,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方面却获得解放。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和《八位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到台湾开会。去年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绍兴、南昌、温州和山西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虽然不大自由,却也开阔了眼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岁买车,如今已经是老司机了。我想开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长度无法控制)。有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过承德、围场、秦皇岛、北戴河等地。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便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